

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的诞生

徐平

军旗和军徽，是军队的重要标志。我军自1927年“八一”南昌起义创建后，直到22年后，才有了全军统一的军旗、军徽，即人们熟知的“八一”军旗和“八一”军徽。

军旗、军徽作为军队的标志图案，通常和军队一起诞生。我军的军旗是在革命战争时期产生和逐步定型的。我军一开始并没有自己的军旗，南昌起义部队使用的仍是国民革命军的旗帜，各地起义军的军旗也不统一。1927年9月初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——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师设计了军旗样式：旗幅为红色，象征革命；中央为白色五角星，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；星内嵌交叉的镰刀斧头，表示工农大众紧密团结；靠旗杆一侧旗幅的白布条上竖写“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”。这是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。此后，中国工农红军的军旗样式曾作过多次修改，但组成军旗的基础图案（五角星、镰刀、斧头或锤子）和鲜红的旗色没有变。1930年4月，中央军委发布的《关于红军各级军旗的规定通知》中，规定旗幅上方增加横写的“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”字样，旗边加饰旗须，并确定了旗帜的规格、斧头样式和刀锋的方向等。1931年3月，中革军委颁布了《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红军旗帜印信样式》，红军军旗的样式有较大变化，镰刀斧头改为金黄色镰刀铁锤，五角星由白色改为金黄色，单独置于旗幅内上角，以旗须颜色区分部队属性。同时还规定了授旗范围和红军各级旗帜的规格。然而，这种军旗也只使用到1937年。

抗日战争开始后，红军改编为八路军、新四军，使用国民革命军的旗帜。解放战争初、中期，人民解放军各个部队都打的是红旗，即没有图案和字样的素面红旗，当时全军也没有统一的军旗。

至于军徽，由于受战争形势的制约，从1927年建军后，我军就一直没有制定自己的军徽样式。

1948年初，提出设计军旗、军徽

1947年下半年，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，全国战局发生巨大变化。1948年初的战局已清楚表明，人民解放军不久即可向全国进军，彻底打垮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。然而，这时人民解放军尚无统一的旗帜和个人佩戴的标志。设计统一的军旗、军徽及帽花（帽徽）、臂章，使人民解放军以崭新的面貌挺进新区，成为迫切需求。

在周恩来提议下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等领导研究决定，由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份指示电，经毛泽东修改，于1948年2月21日发给各中央局、分局、各军区、各野战军前委，征求对设计人民解放军军旗、军徽、帽花和臂章的意见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、军徽、帽花和臂章，均尚无正式规定。现我军向外进攻，发展新区，已渐感觉有此需要。过去使用国民党党徽作帽花的，自应宣布一律取消。惟有些部队已自动带上红五角星作帽花，亦应与苏军帽花完全混同，不甚合适。兹特通令，征求各中央局、分局、各军区、各野战军前委及中工委、中后委意见，望于一个月内外提出你们对于人民解放军的军旗、军徽、帽花、臂章的具体意见。为了征求意见，除你们自己研究讨论外，你们可以组织一个专门讨论此项问题的委员会，提出方案供中央选择，以便颁布统一规定，全体遵行。

此后，一个征集军旗、军徽图案设计样式方案的活动，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军在全军展开。各单位上报的设计图样，统一送到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的中央工作委员会。军旗、军徽样式的汇集、综合和研议工作，由军委作战部一局承办。

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，总共征集到500多种军旗设计样式。面对各式各样的应征图案，设计小组预选出30多种图案制成“样旗”，送交中央领导审选。毛泽东、刘少奇、朱德等领导审阅后，均认可军旗用红底、旗上有五角星的设计，象征着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。毛泽东还指出，军旗上要有“八一”两字，表示南昌起义是建军的日子。

在军徽图案中，有以齿轮象征历史的，也有以刀、剑、戈、矛、步枪、盾牌、长城象征人民武装的……但这些图案中均无“八一”两字。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这些图案没有充分体现人民解放军的特点，因此送审的图案均未被选中。

军旗、军徽最终从3种方案中产生

1949年3月13日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《关于军旗的决议》，其中明确规定：“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（底），加五角星，加‘八一’二字。”之后，周恩来指示军委作战部李涛、军委作战部一局作战室副主任张清化、作战室二科科长江右书等人：军旗图案已经原则通过，但五角星和“八一”两个字的位置怎么摆放，你们再具体设计几个方案，待进一步审议后，确定一种样式，制作标准的样旗、军徽。

受领任务后，军委作战部从各军区抽调参谋人员，组成工作组，在设计军旗样旗的同时，按照毛泽东关于军旗上要有五角星和“八一”二字的精神，加紧设计军徽，并很快上报了“八一”军徽的图案。

1949年4月26日，毛泽东审阅，修改了李涛关于军徽问题的请示报告，并定于5月1日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（草案）公布。

待公布的这枚军徽，红五角星里没有“八一”字样，但“圆周围以宽二厘之红边。红边之正上方、正左方、正右方各开一宽四厘之缺口，即成‘八一’二字。”由于这“八一”二字过于抽象，方案没有被采用。而最终的军徽样式是受到军旗送审图案的启发。

就在军委公布解放军军徽之前，组织工作人员将军旗的3种送审图案请中央领导审阅。其中，方案一是五角星外加“八一”二字，置于旗杆一侧的左上方；方案二是五角星置于中央，“八一”二字竖排，置于五角星内；方案三是五角星右侧加“八一”二字，置于上半部中央，下面加几条蓝色波纹水线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看过后，军旗样式倾向于第一种方案，军徽样式倾向于选用军旗的第二种方案，认为将“八一”放在五星中央更好。于是，工作组的同志们循着第二个方案的设计思路，加班加点绘制了新的军徽样式：底色为红色，将“八一”二字置于五角星中央，字体为宋体汉字；五角星的周边和字均为金黄色。

周恩来在书记处会议后，对张清化等人作进一步指示：我们解放军很快就要渡过长江向全国进军了，不能等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再批准颁布，要尽可能快些，以便解放军能戴着新的军徽，把军旗插遍全国。

正式公布军旗、军徽样式

1949年5月30日，周恩来致电各野战军，各军区司令员、政治委员及各级军政首长：

兹颁发军委制定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七百份，请即点收，并请各野战军、各军区遵照制定各所属部队，并定于六月十五日全军正式开始启用。随电附发之军委命令及军旗、军徽图样……政治机关应按照军委命令在部队中广泛地进行教育，阐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、军徽含义，务使全体指战员有深刻的了解，并自觉维护我人民解放军光荣旗帜的严肃。

1949年6月15日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，副主席朱德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彭德怀，发布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》的命令，规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的样式：军旗旗面红底，长方形，横直为5：4，靠旗杆上方缀金黄色五角星和“八一”两字；军徽为镶有金黄色边的五角红星，中嵌金黄色“八一”两字。

新华社在公布这一命令的同时，发表了题为《把人民解放军的军旗插遍全国》的短评，指出：“军旗和军徽上都缀着一颗金黄色的明星，缀着‘八一’两个字。这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，已经用灿烂的星光照耀着中国。”“中国人



1949年6月15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。



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，受阅部队擎着“八一”军旗走过天安门广场。

人民解放军正在成为一支完全正规化的军队；它的军旗和军徽的颁布，正是它的正规化的重要标志之一。”短评最后强调：“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和军徽，不但是人民解放军的标志，也是我们的人民民主新的国家的重要象征。因此，全国的人民和全国的解放军，都必须一致保卫它的尊严，要像爱护我们自己的生命一样来爱护它们。”

根据规定，凡中国人民解放军团级以上部队、院校，均授军旗一面。从1949年6月15日开始，全军各部队利用战斗间隙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。同时，全军开始陆续佩戴军徽图案的帽徽。自此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标志“八一”军旗和“八一”军徽正式在全军使用。

“八一”军旗和“八一”军徽自公布使用后，既是全军的，也是陆军的。因为当时我军为单一陆军，还没有其他独立的军种。新中国成立后不久，空军、海军领导机关先后组建，成为独立的军种，并在“八一”军徽基础上，先后设计使用了各军种的军徽。而各军种的军旗，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。1992年9月5日，中央军委发布命令，公布在“八一”军旗基础上设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、海军、空军军旗样式。2015年12月31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正式成立，并启用火箭军军旗。

链接历史

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罗浮山之麓的东江纵队纪念馆，南望享誉千年的白莲湖，西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冲虚古观。馆门前广场的西侧，屹立着东江纵队的将士群雕；东侧则是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。纪念馆占地面积5584平方米，内设4个展示厅，引领我们寻觅先辈的足迹，感受腥风血雨的岁月。

1943年，在华南坚持斗争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（东江纵队前身）取得多项战果：1月至10月，向日伪军主动出击，拔除了广九铁路及宝太公路、莞城—太平公路沿线的一批据点；争取了伪军1个营反正，2个连投诚；海上独立中队以少胜多，在大亚湾全歼伪海军1个大队。

当时，香港是日军物资补给、转运的主要港口，而直通香港的广九铁路便是其主要运输线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为此，日军在广九铁路各车站部署重兵把守，并强迫群众抢修铁路，还摧残伪军汉奸等为非作歹。

广东抗日军民粉碎『万人大扫荡』

汤炎忠

11月18日凌晨，日军第104师团主力2个联队和伪军第30师共9000多人，采取分进合击战术，气焰嚣张地扑向大岭山根据地，展开所谓的“万人大扫荡”，企图一举消灭游击总队主力，夺得广九铁路的绝对控制权，巩固广州和香港两大中转站。

按照日军计划，从莞城、太平和桥头出动的日伪军，从北、西、西南逼向大岭山；由常平、樟木头、平湖出动的日伪军，从东面扑向大岭山；伪军第30师进至大岭山以南东莞、宝安一线，隔断大岭山和阳台山两大根据地之间的联系，形成“铁壁合围”。而此时，大岭山区方圆10多平方公里内，驻扎着由副总队长王作尧、政治部主任杨康华等率领的游击总队第三大队、珠江队和总队机关，合计1000多人。

18日夜，游击总队兵分三路向外突围。恰巧此时，山野中刮起大风，茂密的树林沙沙作响，为突围行动提供天然掩护。部队利用天时地利，抄小路、翻山岭、过河沟，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敌人眼皮底下钻出包围圈。

19日黎明，日伪军携飞机、大炮向大岭山发起总攻。大岭山顿时火光四起，浓烟滚滚。日伪军原以为“势如破竹”，结果爬上山顶一看，个个都傻眼了——折腾半天，居然一个游击队员的踪影都没见着，闹出个天大“笑话”。眼见合围失败，日伪军只好留驻大岭山继续“扫荡”，设立据点，建立伪政权。

22日，日伪军又抽调500多人兵分多路围攻阳台山根据地中心的龙华、乌石岩地区。此时，已从大岭山突围出来的游击总队主力，迅速出击南社、常平、东坑、松木山、莞太路等后方之敌。同时，驻守阳台山的宝安大队和已转移至此的珠江队，在龙华、观澜、布吉、南头、乌石岩等地灵活机动地与敌周旋，通过伏击、袭击、阻击等战法，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。

经过1个多月的战斗，游击总队不仅粉碎了日伪军的“万人大扫荡”，还打通了广九铁路沿线的解放区，切断了日军南线交通大动脉，以实际行动策应了反法西斯盟军对日军的反攻作战。

12月2日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基础上扩编的东江纵队宣告成立。此后，东江纵队率领东江人民开展抗日斗争，英勇杀敌，屡建奇功，成为华南抗战的中流砥柱。

见证军属建功支前的奖状

李达 尹邦吉

在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中，收藏着一张保存完好的“特等模范家属”奖状。白色粗布上印有“陈敏同志：特等模范家属”字样，奖状由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、副主席李鼎铭题名，并盖有印章。这是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政府表彰军属的重要历史见证，承载了八路军军属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、建功支前事业的红色记忆。

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，日军集中主要兵力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；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，延安的财政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毛泽东发出“自己动手”的号召。抗日根据地军民相继掀起大生产运动。大生产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展开，边区政府专门成立生产委员会，数万边区军民迅速投入大生产热潮中，涌现出一大批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。八路军第120师359旅717团政委谭文邦的妻子陈敏，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

1938年，陈敏参加革命。结婚后，她在团政治处任组织干事，常年跟随丈夫谭文邦日夜行军打仗。在大生产运动中，谭文邦因为工作早出晚归。作为军属，陈敏默默挑起工作和家庭的两副重担。

1942年3月，陈敏分配到瓦窑堡鞋工厂任指导员。不久厂长调走，管理教育和生产业务都落在了陈敏瘦弱的肩上。为提高大家的积极性，她经常说：“工厂是我们党的，我们是工厂的主人。因此，我们要努力工作，多生产鞋，生产好鞋，支援抗战。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战士光着双脚去冲锋陷阵啊！”

鞋工厂在陈敏的用心经营下，越办越红火，生产的鞋样式好，耐穿又便宜，深受部队和当地群众的欢迎。各地机关、部队都纷纷前来订购。一次，上级要求鞋厂在两个半月时间内生产出1000多双鞋子，这对只有20多人的小厂子来说，是十分艰巨的任务。可接到任务的陈敏二话不说，连夜制订出生产计划，第二天便召开全厂工人会议，决定赶工生产。她自己也日日待在车间里，糊鞋帮、

缝鞋口，一缝就是大半夜，甚至到天明。当工厂按时完成生产任务时，陈敏瘦了一大圈。

1943年秋，陈敏带着一个半岁的婴儿和一岁半的大女儿，随谭文邦调回延安。组织暂时没给她安排工作，陈敏得知359旅大光纺织厂急需棉纱、毛线，并动员全旅纺纱的通知后，她主动响应部队号召，带着两个孩子在家转车纺线。陈敏用勤劳的双手战胜了重重困难，比原计划超额一倍完成了生产任务，成为远近闻名的纺纱能手。陈敏的模范行动，带动了许多妇女走上生产战线。

正是因为陈敏在多个岗位上创造了不凡的业绩，尤其是作为军属踊跃参加纺纱工作，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，展现了革命军属的思想觉悟，传递了共产党人的红色家风。1942年和1943年，陈敏连续两年被评为“特等劳动模范”，毛泽东亲笔为她题写“模范家属”。1943年12月，陈敏出席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获甲等奖。时任359旅旅长的王震称赞她：“陈敏同志不愧为八路军家属的模范，她是勤劳淳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



陈敏“特等模范家属”的奖状。

的模范，她是勤劳淳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

的优秀建设者”，并号召部队、机关家属向陈敏同志学习。1944年1月，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提出：“提倡家属参加生产，开展陈敏运动……鼓励抗属工属向陈敏看齐。”1944年，边区组织机关、学校、部队的女干部和家属展开“学陈敏运动”。